

摩罗 著

孤独的巴金

——如何理解作家



東方出版社

摩罗 著

孤独的巴金

——如何理解作家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的巴金：如何理解作家/摩罗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ISBN 978-7-5060-3972-7

I. ①孤… II. ①摩…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世界 ②文学评论—世界 IV. ①K815.6 ②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9103 号

孤独的巴金——如何理解作家

作 者：摩 罗

责任编辑：姬 利 陈书芬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0.5

字 数：12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3972-7

定 价：27.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6660 (南方)

(010) 65136418 65243313 (北方)

团购电话：(010) 65245857 65230553 6527686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66204

目 录

关于鲁迅的几个热点问题 001

鲁迅的性格和人品究竟如何？他真的那么冷酷刻毒吗？鲁迅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家？有没有自己的特异思想和思想体系？鲁迅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究竟是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大作家？鲁迅杂文的意义如何，他放弃虚构文学创作，一心经营杂感文是不是值得惋惜？鲁迅对主张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是不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偏见或误解？

孤独的巴金 016

巴金实际上是在拒绝世人以一个作家的形象给他定位。他的理想一直是做一个顶天立地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整地球秩序的英雄，而不是做一个文字匠。他一遍又一遍地解说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作家头衔，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被世人塑造成一位“文学大师”。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歪曲。这位孤独的文化老人，一定还在无望地等待着这个古老民族对他作出新的理解……

初读废名 022

废名，这位出自湖北黄梅的书生，自称以唐人绝句笔法写小说。其间的诗意，不趋时尚、不媚流俗，一本自我之悟，率性而作。这不但表现了

一个作家的艺术勇气，也表现了一个人的做人的力量。老是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要求文学写作，老是以流传与否为标准来要求作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错误之一。

《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 025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是真正的珍稀物种。她的作品不但因为独特而成为不可复制的绝品，而且因为具有这种非常深沉的悲情气质而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启迪了读者的生命体验，并且一定程度地弥补了现代文学的浮躁与浅薄，从而为下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开启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资源，标示出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末世的温馨——汪曾祺论 051

艺术家是一个心灵敏感的特殊群体。敏感又往往与脆弱相亲相近。汪曾祺正是一个敏感而又脆弱的人，他所感到的黑暗与血腥不是比常人少，而是比常人多。但他未能通过精神的洗礼超越脆弱，无法获得鲁迅式的担当黑暗、批判丑恶的力量，他只能用遮掩的方式，维持心理的平衡、态度的平和。艺术实践却常常按着自身的情感需要而将他的遮掩揭穿，使得他的创作不至于因为平淡而过于静穆和单调，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灵动性和丰富性。

喜剧时代的批评家——刘震云论 078

刘震云的文学实践逼使我们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概念作为阐释他的文学成就的基点，否则就无以把握他的艺术世界和他精神体验的独特性。在屈指可数的一小批优秀作家中，刘震云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对中国生活的最痛切的体悟、最深刻的洞悉，以及对其体悟和洞悉的外具谐谑效果、内具耻辱意蕴的艺术表现。他对中国生活的解剖和批评在当代文坛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灵魂搏斗的抛物线——张炜论 101

张炜是个现实感极强的人。他一旦从旧的文学观念中摆脱出来，就注定了要以这种姿态写作。他与他笔下的人物心心相印，对他们的愤怒尤其心领神会。他要捍卫的乃是人性深处的某种需要，是超物质超功利的人性尊严。这是张炜在抗御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时所得到的独特发现，他日后能够在文坛上脱颖而出，靠的就是这点发现。沉重、压抑、忍辱负重、咬牙切齿，在沉默中无望地等待，在等待中痛苦地沉默，这一切成了张炜作品中最常见的情调与意象。

逃遁与陷落——苏童论 120

与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苏童本人也是一位逃遁者，至少是一位文学世界的逃遁者。逃遁者苏童的被动性似乎比我们平时所估计的更强一些。逃遁者苏童的逃遁方向倒可能主要是由迫使他逃遁的那些因素从反面予以规约与决定的。稍一留心即可发现，苏童的文学面貌是在与他的文学对手的对抗中逐步形成的。在苏童看来，正统文学的那些秉性都是不真实不可靠的，为了捍卫一个作家的良知与尊严，他只能别无选择地逃向它的反面。他甚至无法从美学角度对他的逃向作出从容的审视与思考，因为逃遁永远是危机中的权宜之举，是匆忙而又草率的抉择，即使是沼泽泥潭，也不得不一脚踏进去，哪里还有从容可言。

大师的眼睛 134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内心的柔弱和恐惧。也许你会像触电一般被他唤醒了自己内心同样的柔弱与恐惧，也许你内心苏醒的是对于一个柔弱而又恐惧的孩子的深深的怜悯与关爱。总之，只要你看见了这样的眼睛，你就一辈子摆脱不了他对你的倾诉与吁请。

作家与世界的关系 142

文化是穿透前人经验、审视人类生活、把握人类命运的能力和禀赋。一个创作者虽然也必须一定程度地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为精神文化提供自己独特的东西。这种独特的东西不是像学者那样根据前人的经验推演、归纳出来，而必须从个人的独特体验、独特感受、独特思考、独特想象中生长出来。这就需要仰仗内在的禀赋和文化想象力。所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发展空间的，是他对于人生和世界体验的深度，对这些体验挖掘和思考的深度，以及他的文化想象力发达的程度。

缪斯的呼吸 154

并不是凡能写字造句者就能当作家。作家需要那么一点灵性，需要那么一点高贵的想象力，需要那么一点英雄主义，需要那么一点超尘脱俗穿越虚无的清虚之气。如果一个时代产生不了这样的写作者，那么文学的灵地将会被世俗精神所淹没。人类的最后一点灵气将会变为奄奄一息甚至会彻底窒息。文学应该留一份灵性给人类，作品应该留一份灵气给读者，作家应该在自己的内心留一片灵地给文学。

关于鲁迅的几个热点问题

一个文化巨人既给了我们许多启迪，也常常会留给我们许多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带给我们启迪的因素之一。

鲁迅留给我们的问题为数不少，每一个问题都具有相应的文化意义，很值得我们追索。有的问题从鲁迅作为一个作家诞生于中国文坛起就已经存在，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读者的谈兴。有的问题则是这个时代的读者结合自己的时代状况和文化氛围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但体现了这一代读者的思考能力，而且体现了鲁迅的思想世界能够与后人对话的开放性。

本文选择了被读者和研究者谈论得比较多的几个问题，顺便介绍一下一些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有些是对立的，有些则是互为补充的。问题如下：

鲁迅的性格和人品究竟如何？他真的那么冷酷刻毒吗？

鲁迅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家？有没有自己的特异思想和思想体系？

鲁迅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究竟是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大作家？

鲁迅杂文的意义如何，他放弃虚构文学创作，一心经营杂感文是不是值得惋惜？

鲁迅对主张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是不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偏见或误解？

鲁迅的性格和人品究竟如何？他真的那么冷酷刻毒吗？

许多人认为鲁迅世故、多疑、刻薄，有的人认为鲁迅阴暗、冷酷、狠毒、愤怒、憎恨，骂人没有节制，不讲宽容宽恕。甚至还有人认为鲁迅心理病态、人格卑污。鲁迅自己也说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那么，鲁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心理特征究竟是什么？他的性格怎样？他的人品怎样？

鲁迅的文学风格的确是荒凉冷峻的，但这荒凉冷峻的风格背后是不是就一定是一颗荒凉冷峻的心？有没有可能他的灵魂的色彩和氛围正好与此相反？鲁迅的文字的确常含讥讽，但是讥讽的背后是不是就一定就是恶意？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愿正好是善良而又温柔？鲁迅的心理的确十分敏感甚至过分敏感，但是，心理不敏感的艺术家的确还能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吗？为什么历史上的研究者对于鲁迅的解读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鲁迅的人格特征？

苏雪林对鲁迅的认识最为特别，关于鲁迅的性格，她说：“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的阴贼，巉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都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关于鲁迅的人格，她说：“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综观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状，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关于鲁迅的影响，她说：“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这位苏女士将鲁迅描绘为有史以来第一恶棍。

对于鲁迅的心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朱大可近年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多有分析，朱说：“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它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正义呼声的后面。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

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这一二十世纪最坚硬的道德偶像。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那就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腐败的涌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鼓舞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

与批评鲁迅的人比较起来，为之辩护的人显然更多。如果是他的门徒，其辩护也许感情太深，主观太强。这里选择两个远非门徒的学人关于鲁迅心理特征的议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鲁迅的解读和理解。

比朱大可年轻十余岁的学者张远山认为，鲁迅不但不是恶棍，不是仇恨的火种，实际上是一个很仁慈的人。他在《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一文中如下论述：

事先永不防范，而事后不遗余力做其效尤，正是鲁迅的独特“恕道”——传统的恕道是在后的：先防范，被伤害后无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宽恕”。而鲁迅的恕道是在先的：先不防范，被伤害后就“不宽恕”了。很明显，传统的事后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虚假标榜；有能力反击却真正宽恕的人，少得几近于无。而鲁迅的事先恕道却是货真价实的，是真正的大恕；当然也由于他是强者，事先不防范，是因为有真正的实力和自信。那种事先用自私自利的不信任逼得人人自危，弄到不可收拾才来抹稀泥，卖弄其事不关己的“宽容”，正是鲁迅毕生视为死敌的传统毒素。“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杂感》）鲁迅的愤怒，是对“更强者”的愤怒；鲁迅的“不宽恕”，同样是对“更强者”和恃强凌弱者的“不宽恕”。对“更强者”的愤怒和不宽恕，正是为了替更弱者打抱不平，是鲁迅身上的眉间尺式的豪侠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不断有更弱者仅仅因为鲁迅对“更强者”的不宽恕，而对鲁迅“愤怒”了。更弱者竟然来为“更强者”抱不平了！鲁迅能不吃惊吗？鲁迅能不这样想吗：这真是咄咄怪事，诚不知人间何世！然而答案却简单得出奇，说出来竟要让人失笑：

更弱者替更强者打抱不平，是对更强者的献媚，以便得到更强者的保护，甚至接纳自己加入更强者集团，去欺凌其他的更弱者。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智者鲁迅会想不到吗？当然不是。那么鲁迅为什么好像永远不知世事呢？是因为仁者鲁迅不愿“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在鲁迅身上，仁慈的成分压倒了智慧的成分。

鲁迅的同时代人，与他并不接近的学者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有意回应了社会上对于鲁迅心理生活的各种猜疑（也是多疑的一种）和批评，不过他是选择鲁迅作品的风格作为进入话题的入口。在他看来，鲁迅是一个十分率真的人，一个真正和平的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说：

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

在《阿Q正传》里，我们看一切人对阿Q是没有同情的，可是这一般人之为阿Q没有同情，却正是显示作者鲁迅对阿Q之无限的同情。

许多人以为鲁迅世故，甚而称之为“世故老人”，叫我看，鲁迅却是最不世故了。不错，他是常谈世故的，然而这恰恰代表出他之不世故来。

鲁迅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和平，人道主义，这才是鲁迅更内在的一面。

他的为人极真。在文字中表现得尤觉诚实无伪。他常说他不一定把真话告诉给读者，又说所想到的与所说出的也不能尽同，然而我敢说他并没隐藏什么。容或就一时一地而论，他的话只是表露了一半，但就他整个的作品看，我认为他是赤裸裸地，与读者相见以诚的。鲁迅的虚伪，充其量不过如人们传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虚伪。在鲁迅的作品里，不唯他已暴露了血与肉，连灵魂，我也以为没有掩饰。

李长之的言说十分客观公允，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态度。他具有出色的艺术

感觉力和文学鉴赏力，能够从文字往里读，直读到作者的心性和骨肉。从李长之的“和平”说，到张远山的“仁慈”说，对鲁迅的理解可谓入骨三分。

当然，理解鲁迅并不是要有意否定他的性格特征。社会上对于他的性格的批评并不是没有依据，说他多疑、尖刻就像说他的作品冷峻荒寒一样并不是无稽之谈，问题是如何理解他的这些特征。钱理群认为鲁迅的这些心理特征，恰好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要知识分子放弃艺术家或者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模式，以改造得跟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模式完全一致。这既是对艺术家人格的不尊重，也是对艺术的无知和不尊重。当我们隔着历史的宽阔缝隙打量和谈论鲁迅时，应该格外小心，不要不经意地显出这种不尊重。

鲁迅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家？有没有自己的特异思想和思想体系？

“思想家”和“民族魂”是鲁迅获得的最高荣誉称号。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家，在他生前就有不同意见。李长之一九三六年写作的《鲁迅批判》，是鲁迅生前所出版的唯一一部研究鲁迅的学术专著。针对鲁迅“思想家”的称号，李长之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

李长之的观点很有点代表性，读书界一直有人认为鲁迅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给人类思想史贡献独特的思想，谈不上是一个思想家。

但是肯定鲁迅是一个思想家的观点似乎一直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在李长之写作《鲁迅批判》的同一时代，冯雪峰说：“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上他。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他不但认为鲁迅是思想家，而且认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比作为作家的鲁迅更加重要。

毛泽东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从本阶级本集团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思想家地位。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思想家的名号之外，毛泽东还给鲁迅添加了革命家的头衔。这个头衔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人们逐渐放弃了这个说法。因为汉语语境中“革命”一词一般指称社会政治运动，与鲁迅的实践生涯不相恰。但是，也有人从思想史上别立新宗的革命意义，来确定鲁迅是一个思想意义上的革命家。钱理群、王富仁、王乾坤在这方面都有论述。

在后毛泽东时代产生过巨大学术影响的李泽厚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革命青年。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他把思想家鲁迅放置在文学家鲁迅也就是鲁迅的作品基础之上，他的观点比毛泽东的观点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

那么，鲁迅究竟以什么成为思想家呢？除了王乾坤从哲学史角度的阐述以外，大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独特认识和批判，对人民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热烈关注与思考。正是这些批判和思考体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穿透力和睿智。在这些思考中，一些学者很重视鲁迅的“立人”思想，认为这一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有光辉的思想，是他给中国社会的独特贡献。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迅的立人思想越发受到文化界的重视。学者钱理群、王得后，画家裘沙，社会活动家萧鸣等人还共同发起召开过一个“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标志着立人思想受到了新老几代学人（不只是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年轻一代学人对立人思想也体会很深。李新宇指出：“当鲁迅在对本土文化的彻底绝望中把寻求的目光投向西方时，他找到的是什么？对于当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一代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现，而鲁迅首先发现的是‘人’！这一发现与他的文化批判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正是因为人的发现，他才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吃人性质，而中国文化吃人性质的发现更进一步地使他倾心于

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他认为立人思想是建立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

老一代学者钱理群特别强调，鲁迅的立人之“人”是一个个生命个体，是真实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人民、公民等抽象概念。“真正的人道主义要关怀具体真实的人，强调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这是鲁迅一个最基本的思想，他要把‘人’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自身。”

鲁迅究竟以什么构建他思想家的权威？思想家鲁迅究竟是什么学术形象？他有没有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我认为王得后结合鲁迅立人思想所作的一段论述，非常中肯，征引如下：

鲁迅独特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

“立人”的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始终，遍及鲁迅著作的各个方面，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自己毕生为在中国实践“立人”这一思想而斗争。因此之故，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1]

鲁迅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究竟是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大作家？

对于思想家鲁迅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对于文学家鲁迅的杰出成就在鲁迅研究初期几乎没有争议，文坛学界各种人物都承认鲁迅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报纸上甚至称他为文坛唯一权威，学界唯一领袖。

鲁迅受到普遍称道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小说。冯雪峰、胡风、茅盾、李长之、胡适、傅斯年、苏雪林等等各色人等，对鲁迅的小说都评价很高。《阿Q正传》尤其被看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作。

进入毛泽东时代以后，鲁迅是新一代政权的文化旗帜，他的作品更是受到最隆重的称赞和最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作家就是鲁迅。从传播的角度看，鲁迅的作品在好几代读者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尽管由于几十年来传播鲁迅的方式带有明显强势灌输色彩，加上中学课堂对于鲁迅作品的解说过于狭窄、陈旧和枯燥，引起许多年轻学生的隔膜和烦腻，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学生心目中，鲁迅依然是中国近代以来至高无上的作家。

鲁迅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挑战。有一些研究者和读者认为鲁迅只是在出道的早期写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后来灵感逐渐衰竭，文学创作没有发展，所以成就不可估价过高。近年著名作家王朔发表《我看鲁迅》，对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不同于学者的直感的批评。他说：“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

与此同时，对于鲁迅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有越来越多的质疑。与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相比较，鲁迅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是不是当得起大师称号？会不会只是相当于第二流、第三流作家？王朔直率地指出：“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王朔的观点代表了很多读者的看法。

从鲁迅的创作体现时代痛苦、切入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度而言，鲁迅当然是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从文学文本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及其可读性而言，王朔的观点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鲁迅杂文的意义如何，他放弃虚构文学创作，一心经营杂感文是不是值得惋惜？

对鲁迅文学大师地位的肯定与质疑，很大程度取决于对他的杂文的评价。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的时间很短暂，所以作品也很少。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用了全部精力进行杂文写作，具有强烈批判倾向、论战色彩的感想性文字，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人类内心的黑暗进行了坚决的攻击和解剖，那是一个灵魂批评家对一切丑恶现象所进行的文本细读式的批评。尽管中国文学史具有昌盛繁荣的小品文传统，但一般都认为鲁迅式的杂感是他独创的文体，它与历史上的小品大异其趣，卓然独立，自成一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别收获。有的人甚至认为，鲁迅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因为他用杂文的方式对中国历史和前途表达了明确的批评和思考。

早在一九二七年，茅盾就在《鲁迅论》中阐述了鲁迅杂文与其小说的关系：“在他的创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在他的杂感和杂文里就有正面的说明。单读了鲁迅的创作小说，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须也读了他的杂感集。”多年以后，在追悼鲁迅逝世的气氛中，茅盾指出，杂文“这一新的形式，是他所发明，所创造，而由他发展到最高阶段”。

一九三三年，瞿秋白编选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序，他把鲁迅杂文既看作他的精神自传，也看作战斗武器，据此高度评价鲁迅在思想史和当时社会政治斗争中的意义。他称鲁迅杂文为“社会论文”和“文艺性的论文”。

一九三六年七月，冯雪峰在给捷克译者介绍鲁迅时指出，鲁迅杂文是鲁迅的艺术天才另一种形式的展开和发展，应该用看待长篇巨制的眼光来看待鲁迅杂文。“他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长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是更为大众所重视。他的杂感，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

以上瞿秋白和冯雪峰的论述，都是经过鲁迅过目并首肯的，可见以杂文方式参与改造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灵魂的历史实践之中，是鲁迅自觉的追求。

一般来说，左翼人士比较看重鲁迅杂文，右翼人士则对他的杂文肯定不多，有的人还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即使是那些充分肯定他的小说成就的人，也多半对他的杂文不以为然（比如胡适）。苏雪林对鲁迅人格进行严厉的否定，主要依据的就是鲁迅杂文。“文学无非作家个性的表现，不管是谁读了鲁迅的

杂感都觉得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的阴贼，峻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都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可见在她看来，鲁迅杂文篇篇都是充满毒汁的恶花毒草。

很多人把鲁迅从事杂文创作看作他灵感衰竭的证明，这本身就是对他的杂文的文学意义的否定。毕树棠说：“若以鲁迅和其他作家比较，当以小说为主要，散文次之，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是他的散文的糟粕。在艺术上，他是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到他晚年，似乎已没有灵感了。”

陈源说：“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中间派人士的意见则相对客观一些、公允一些。比如李长之认为：“就鲁迅自己而论，杂感是他在文字技巧上最显本领的所在，同时是他在思想情绪上最表现着那真实的面目的所在。就中国十七年来的新文学论，写这样好的杂感的人，真也还没有第二个。”虽然没有涉及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但从文章的角度谈论得很中肯。

叶公超对鲁迅杂文的态度也比较和缓，从文章角度予以有保留的肯定，对于其思想价值，其实未予注意。他说：“鲁迅最为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十四册中，除掉谩骂，嘲戏，以及零星小品之外，还有委实耐读的文章在。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约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知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上海文坛发生了关于“鲁迅风”杂文的争论。巴人等人主张应该学习、继承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并且力争发展和超越。阿英等人则认为现在是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代，不应该学习鲁迅那种苍凉、迂回、讽刺的言说方式和言说态度。

另一场关于鲁迅杂文精神的争论出现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那时候延安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丁玲发表《我们需要杂文》，指出“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为中